美国动态（半月刊）

2022年7月19日（第264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美国难以实现对华“脱钩”

尽管有专家认为“脱钩”将自行缓慢发生，当前的一些贸易数据也的确显示出一定趋势。但可以确定的是，若美国执意加速对华“脱钩”，在并未制定明确应对策略的情况下，“脱钩”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亦会殃及美国自身。事实证明，中美“脱钩”难以达成。

中美关系

西班牙前外长：美西方应重建在拉美的影响力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杂志网站 7 月 14 日登载西班牙前外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的文章称，除非美西方改变策略，否则可能在对华竞争中失去这一关键地区。文章摘要如下：

美西方与“威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凸显了拉丁美洲作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然而，美西方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且有迹可循。许多拉美国家拒绝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的队伍中。此外，墨西哥和玻利维亚总统曾公开表示——若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同行未被邀请——将抵制美洲峰会。虽然峰会最终顺利召开，但包括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在内的诸多国家只派出外长参与，整场峰会并未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没有继承前任对拉丁美洲的敌意，但拜登政府也未能实施有效的区域参与政策。而此时，中国继续扩大其在拉美的足迹。从 2002 年到 2021 年，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总额从 180 亿美元飙升至近 4490 亿美元，按照这一速度，到 2035 年贸易额将超过 7000 亿美元。并且，已经有 21 个拉美国家参与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中。

美西方不能失去拉丁美洲。该地区是燃料和食品的主要生产区域，可以填补重要的供应链缺口。更重要的是，美国要振兴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需要拉美国家的支持。要重建美国在拉丁美洲失去的信誉并非易事，需要时间、承诺和外交影响力。美国可以先寻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移民等问题上与拉美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美专家：美国难以实现对华“脱钩”

尽管有专家认为“脱钩”将自行缓慢发生，当前的一些贸易数据也的确显示出一定趋势。但可以确定的是，若美国执意加速对华“脱钩”，在并未制定明确应对策略的情况下，“脱钩”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亦会殃及美国自身。事实证明，中美“脱钩”难以达成。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网站近日登载该刊高级记者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的文章称，尽管对华“脱钩论”风靡一时，但中美两国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意味着“脱钩”并不现实。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执政以来，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强调中国的战略威胁，寻求对华贸易“脱钩”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就目前来看，在高科技和社交媒体行业，中美两国的“脱钩”明显。但就中美商品和服务的整体贸易而言，“脱钩”并不明显，且较难实现。原因有四：

第一，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依然深厚。从农产品到一系列制造业原材料和零部件，两国的合作仍在不断加深。美国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预计本财年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360 亿美元，是 2020 财年的两倍多。此外，虽然表面上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有所下降，但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却在不断上升，尤其是与那些在过去几年受益于中国商业投资和出口业务转向的国家。

第二，美国企业持续加大在华投资。上海美国商会对 300 多家在华美企进行的新调查显示，与 2020 年相比，60%的美企在华投资有所增加。诸多经济学家表示，“硬脱钩”对中美两国而言

是非理性的双输局面，中国市场的巨大利润将促使美国企业继续留在中国。

第三，美元飙升加大了对华“脱钩”的难度。由于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以及新冠疫情期间资本大量流入等因素，美元币值被高估了 25%至 30%。这使得美国出口商品成本持续攀升，而购买中国商品的成本则有所下降。加之疫情对实体零售业的打击，美国对中国电商巨头的依赖进一步加深。

第四，在通胀压力下，拜登政府已开始稍微缓和其对北京的言论，并考虑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部分关税。此外，拜登试图以气候问题为突破点大力推动美国经济的绿色转型，而中国的太阳能技术占据主导地位，两国存在合作空间。

尽管有专家认为“脱钩”将自行缓慢发生，当前的一些贸易数据也的确显示出一定趋势。但可以确定的是，若美国执意加速对华“脱钩”，在并未制定明确应对策略的情况下，“脱钩”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亦会殃及美国自身。事实证明，中美“脱钩”难以达成。

美学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种政策考量

近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登载美国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政治学副教授布伦丹·里滕豪斯·格林（Brendan Rittenhouse Green）等人的文章称，若中国大陆收复台湾将极大提高其军事地位，美国在此问题上存在三种政策考量。文章摘要如下：

台湾具有重要但经常被低估的战略价值，收复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大有裨益。如果大陆迅速且轻松地收复台湾，就能够释放出原本的对台军事力量，追求其他军事目标。并且，大陆

还能接手台湾的战略资源，增强自身实力。如果大陆与台湾陷入长期僵持状态，北京的实力也可能受到损害。但只要大陆下定决心收复台湾，就能够在其周边部署关键军事装备，提高海洋监控能力，以此限制美国在菲律宾海域的军事行动。

一旦台海危机爆发，无论结果如何，亚洲军事力量平衡都可能发生改变。台湾的军事价值意味着美国必须与台湾保持友好关系，并阻止大陆的对台行动。在亚太总战略的统领下，美国存在三种对台政策考量：第一，维持当前的对华遏制战略，保留在亚洲的盟友网络和前沿军事存在。选择“保卫”台湾的代价可能会极其高昂，需要美国放弃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明确承诺如果发生冲突，会为台湾提供军事支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此举会引发大陆和美国的双边军备竞赛，加剧竞争风险。

第二，设置更灵活的安全边界，取消对台承诺，保留亚洲联盟体系和部分前沿军事力量。此举能减少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也会带来其他军事成本。大陆在该区域内军事实力的上升意味着美国军队将需在更危险的区域执行任务。此外，面对大陆军事优势的上升，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美国的亚洲盟友可能要求美国提供更明确的安全保证，包括更紧密的防务协定以及额外军事援助等。

第三，美国结束对台承诺，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弱化传统联盟关系。该政策可能会减少美国对日本防务的直接军事支持，甚至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所有安全承诺。但即便如此，台湾的军事价值仍有可能造成危险的地区局势。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日本可能选择介入台湾问题，这将引发亚洲大国之间的冲突。无论愿意与否，美国都可能被卷入，最终引发毁灭性战争。

无论美国奉行哪一种战略，中国大陆控制台湾都会限制美军在太平洋的行动能力，威胁美国利益。而无论华盛顿是否决定要

阻止大陆的对台行动，都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与代价。

美专家：美国迫切需要制定新战略以应对中国“威胁”

近期，美国《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登载美国国防问题专家詹姆斯·法威尔（James P. Farwell）等人的文章称，美国迫切需要一个能阐明持久战略愿景的新大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全面威胁”。文章摘要如下：

1953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起了由两党国家安全专家组成的“日光浴室项目”（Project Solarium），旨在打造能击败共产主义的大战略。最终，艾森豪威尔选择了凯南倡导的遏制战略对抗苏联。放眼当下，即使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国际背景下，人们也普遍认为，对自由国际秩序更长期、更具生存性的挑战来自中国。因此，美国迫切需要现代版“日光浴室项目”来制定一个新的大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全面威胁”。对此，作者提出三种策略：

策略一：击败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计划在 2049 年之前恢复其主导地位的奋斗目标足以令美国对其采取强有力的报复战略。在该路线的指导下，美国会将中国视为对手或敌人，对其采取孤立和遏制战略。除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污名化中国，扭转中国在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外交和经济成就之外，还会限制中国在亚洲的增长潜力。总之，美国需要让中国意识到与美国对抗是一场负担不起、无法获胜的竞赛。在此情况下，中国将被迫接受美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策略二：分化战略。该战略设想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是西方联盟，另一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协约集团”(China-centric entente)。分化战略承认西方将中国纳入自由

世界秩序的努力失败了，中美处于事实上的冷战 2.0 时代。在该战略指导下，美西方会将中方阵营视为一个整体竞争目标。该策略建立在中美贸易和供应链的有序“脱钩”基础上，辅以其他立法与经济手段，旨在阻止对方影响力的扩大。该策略承认不同阵营的全球影响力，认为接触会降低安全性，因此不会过多干涉或侵犯对方集团内部活动。

策略三：管理性竞争战略。该策略接受多极世界范式，中美各自建立战略阵营。与分化战略相同，管理型竞争战略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但接受机会主义国家在两个阵营之间游走或保持中立。该战略能避免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但会在提出更具吸引力的竞争理念的同时，挑战和诋毁中国提出的全球倡议。管理性竞争战略不排除商业和金融互动。竞争集团之间的贸易将基于经典市场原则进行，但对涉及国家或国际安全的行业会极为谨慎。在气候变化或流行病管理等全球性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在该战略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美国在确保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寻求中美利益趋同点，避免冲突升级。

美国外交

美学者：美国必须警惕其外交政策盲点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网站 6 月 30 日登载其杰出研究员保罗·希尔(Paul Heer)的文章称，美国需要考虑权力均势与影响力对比的历史性变化，警惕其外交政策存在的盲点。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俄乌冲突暴露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两个盲点。其一是华盛顿拒绝承认是美国的行动导致了冲突，且存在延长危机和加剧后果的

风险。俄罗斯在乌克兰受挫后，美国致力于推进彻底击败和永久削弱俄罗斯的策略，然而这并非有助于彻底解决俄罗斯与欧洲的历史积怨，相反会强化俄罗斯的怨恨和脆弱感，从而导致持续性战略敌对。北约扩张同样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会增加与俄罗斯进行一场新冷战的风险。

其二是忽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一味联合盟友遏制俄罗斯。尽管美国成功联合盟友对抗俄罗斯，并且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中显示了其全球领导地位。但事实上，欧洲之外的很多国家认同北约扩张不可取这一观点，并未加入到谴责或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之中。若美国专注于削弱俄罗斯而无视其安全关切，反而会产生反作用。

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仍享有与上一代人同样的影响力、国际支持与道德权威，应正视上述问题并调整其对外政策。

美专家：美应加强地方外交以扩大全球参与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 7 月 2 日刊载杜鲁门国家政策中心政策与项目副总裁乔恩·特敏（Jon Temin）的文章称，美国应当强化城市和州外交以拯救美国的对外政策。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过去的 20 年里，美国外交政策走出孤立主义，从单边主义转向“幕后引领”，试图恢复外交及全球伙伴关系。但当领导人更替时，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总会发生变化，随着政治极化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凸显，这种变化逐渐危及美国对外承诺的可信度。对此，美国应当提升城市和州在外交中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二。

一方面，相比华盛顿，城市和州的党派更替较少，地方领导人需要为选民提供切实服务。提升城市和州在外交中的作用有利

于建立务实、协作和互利的外交伙伴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领导层波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提升城市和州在外交中的作用，还能为外交决策提供更多不同的观点。

当前美国已经在进行的地方外交活动集中在技术和文化交流领域，且往往是独立运作的，缺乏与国务院的联系，其创造的外交渠道处于边缘地位，未得到重视。鉴于此，作者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从结构层面上看，国务院应当设立城市和州外交办公室，加强国务院同地方政府在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方面的沟通合作，并就地方在全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做出规划，提升地方外交能力。第二，各城市和州应当加大对外交的投资，特别是外交人员的投资，建立专门的国际事务团队。

美应加强对东南亚灾害管理事业的援助

美国《外交家》（The Diplomat）杂志网站近期刊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东南亚项目前研究人员梅根·沙利文（Meghan Sullivan）的文章称，美国应加强对东南亚灾害管理的援助以实现和扩大在该地区的目标和利益。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美国有能力在抗灾减灾、人道主义行动方面帮助东南亚，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灾害管理是东南亚区域内合作的重点。重大灾害事件促成了东南亚区域内一系列灾害管理框架和机构的形成，也强化了美国等域外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和国际合作。通过军事、财政和技术援助，灾害管理在美国与东南亚的交往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美国可以利用东南亚灾害管理的缺陷强化对该地区的援助。东盟 2015 年通过了《东盟灾害管理愿景 2025》以寻求弥补在抗灾、防灾、减灾等各环节的弱点和缺陷。美国可以通过扩

大援助以支持该愿景，将资金用于预防性灾害管理这一低投资、高回报的环节。

再次，就灾害管理而言，提供援助的方式和层级问题越来越重要。一方面，美国要将其在东南亚的人道主义行动与气候行动之间建立明确联系，充分发挥投资效果，减少职能重复，加强灾害管理和气候行动之间的凝聚力和协同性。另一方面，自 2016 年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以来，许多人道主义援助从业者开始强调地方层面的领导，调整本地化承诺和本地化战略逐渐成为美国同东盟合作的成熟领域。

最后，围绕自然灾害管理问题的合作具有外溢效应。虽然自然灾害管理并不总是美国同东盟关系的首要议题，但却是推动双边合作的潜在动力。通过灾害管理合作建立的双边信任以及协调和召集机制，为美国和东南亚在更广泛和更具挑战性的领域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传统基金会专家：拜登政府需采取强硬的对伊政策

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网站近期发布其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ips）等人的报告称，拜登政府应放弃外交优先政策，采取更现实和积极主动的策略来应对伊核问题以及地区恐怖主义挑战。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政府放弃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坚持对伊朗采取外交优先政策，寻求恢复 2015 年伊核协议。然而，拜登政府放弃极限施压策略实际上为伊朗推进其核计划提供了掩护，降低了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压力，增加了伊朗的谈判筹码。即便形成新的核协议，也不能解决现有协议的缺点，其效力会更弱、更难以为继。

若伊朗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激进政权可能会进一步支持恐怖主义，推动中东地区核扩散，破坏地区稳定。鉴于此，拜登政府应该对伊朗采取更现实的强硬措施以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国家利益。美国要充分利用惩罚性经济制裁、军事手段等国家力量工具，防止伊朗成为拥核国。对此，作者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加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打击和惩罚违反管制体系的外国实体，并通过情报手段强化执法；第二，同欧洲盟友合作，恢复对伊多边制裁，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孤立伊朗，扼杀伊朗常规军事力量，阻止其他国家帮助伊朗逃避制裁；第三，与盟友一道在波斯湾地区建立有利的军事力量态势，制衡伊朗；第四，加强与地区盟友的安全协作，通过对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军售项目帮助其提升针对伊朗的防御能力，建立一个综合防空系统，加强该地区美军的安全；第五，扩大《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的适用范围。拜登政府应大力支持将协议扩大到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受到伊朗威胁的阿拉伯国家，为扩大区域伙伴关系中的安全合作扫清障碍。

美国左右两派联合反对援乌的原因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网站登载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与政策研究员让·达特基维奇（Jan Dutkiewicz）等人的文章，对美国左右两派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观点的趋同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俄乌冲突爆发后，相当多美国右翼人士以及进步左派倾向于站在俄罗斯一边（或至少不站在乌克兰一边），原本处在政治光谱两端的群体似乎结成了奇怪联盟。这是“马蹄铁理论”的现代印证，极左和极右发现自己惊人地站在了一起。“马蹄铁理论”

由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法耶（Jean-Pierre Faye）提出。他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类似马蹄形，两个极端会像受到磁力吸引一样向彼此弯曲靠近。

尽管极左和极右的政治目标和动机各不相同，但将其团结在一起的是其对建制派的不信任以及赤裸裸的反美主义。许多极右翼人士认为普京和俄罗斯在“文化战争”中是共和党 MAGA 派别的盟友。并且，在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格局中，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任何支持拜登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进步左派反对援乌的动机更多的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信任。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个糟糕的国际角色，无论美国对外国冲突的政策是什么，都是利己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因此，许多左派人士会接受亲俄的框架，将北约扩张视为美国单方面的帝国主义。

“马蹄铁理论”背后的支撑力量涉及政治的另一个维度，即美国政治的民粹主义、反建制的一面。民粹主义推动人们向内靠拢，走向一种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当美国卷入海外事务时，它是为了本国政治或商业精英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民粹主义会煽动起一种对立主义，这种对立主义在一些罕见的全国性共识问题上最为明显。左右两派民粹主义者截然不同的动机导致双方达成了相同的反共识立场，尽管其思想中没有任何内在因素促使其支持俄罗斯或反对乌克兰人。

也许“马蹄铁理论”并不完全正确。政治光谱两端并非天生就会互相妥协。吸引的根源在于两者在观点上倾向于广泛的异质性。更确切地说，是双方的民粹主义和反建制冲动让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仍达成了一致。这暴露了美国政治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对政治现实日益缺乏共同的理解。乌克兰问题并非这一趋势的主角，而是未来事态发展的风向标。

美国政治/其他

美专家：美最高法院裁决限制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有所作为

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7 月 4 日登载纽约市立大学杰出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文章称，气候变化已经造成巨大破坏，而最高法院的裁决却限制了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文章摘要如下：

党派之争是气候政策的核心问题。若是有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愿意支持气候行动，民主党内部曼钦的阻挠和最高法院的裁决都会变得不重要。因为只要简单的立法就可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且通过补贴，或者征税，鼓励国家向着绿色经济过渡。因此，气变议程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归结于共和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行动。

共和党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主流保守党，后者普遍支持气候行动。共和党漠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简单答案是“跟着钱走”。在 2020 年的选举周期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84%、煤炭业 96%的政治捐款献给了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因果关系也可能完全相反，化石燃料行业之所以支持共和党是因为后者反对清洁议程。

此外，尽管与“正常”的保守党相比，共和党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显得特立独行，但它实际上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典型代表。现在重要的是，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威权右翼政党”（authoritarian right-wing party）的大国，其右翼控制着最高法院，有能力阻止不利于气变议程的行动。

美军事专家：美国应打造国家需要的工业网络

近期，美国《国家利益》杂志（National Interest）网站登载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约瑟夫•沃特尔（Joseph Votel）等人的文章称，美国若能形成动态一致的工业网络，有助于克服线性思维的局限性，从而缓解该局限性对美国竞争力的削弱。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过去 80 年里，美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为其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但全球秩序正在改变，竞争对手已然出现，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正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一系列彼此不相协调的委员会尝试作出改变。然而，如果缺乏一个关于最终发展愿景的清晰表达，以及对整个系统核心架构的重新思考和设计，这些尝试的积极影响将无法持续。美国必须从“工业基础思维”转向“网络思维”，将集体能力、人才和创新集中到一个充满活力且协调一致的网络中，这将有助于支撑常规国防工业能力的振兴，也能更充分地整合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创造性、生产性和军民两用能力。

要使这样一个防御网络充分发挥潜力必须具备五个基本特征。第一，必须摆脱美国对战略竞争对手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一无意识假设，转而更关注与近邻之间灵活的、机会主义竞争，包括成为快速追随者的能力；第二，重新配置的工业系统必须激励企业以相应的速度扩大规模，建立起一个由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组成的更加平衡的网络；第三，未来的产业网络必须充分利用美国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资助和激发更多的技术研发；第四，必须学会从所有工业基础部门提取所需的技术，充分利用最初用于商业的技术，避免重复和浪费；第五，促进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吸引相关人才，建立创新型文化。

美进步中心学者：美国需对最高法院进行结构性改革

美国进步中心（American Progress）近日登载该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奥林斯基（Ben Olinsky）等人的文章称，鉴于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力上拥有统治地位，需要对法院进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以减轻其“错误裁决”所造成的损害。文章摘要如下：

在过去一个月里，美国最高法院中的激进多数派对长期存在的先例、法律和宪法权利的破坏体现了司法权的过度扩张。美国需要对最高法院和司法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这能为法院去激进化，并限制极端法官的影响。对此，作者列出五点改革方向：

第一，对最高法院法官实行任期限制。大法官任期的延长意味着其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宪法制定者的预期，导致职位空缺不规则且不可预测。对此，国会可以为大法官设立 18 年的任期限制。这有助于确保未来的总统在每四年任期内可以提名两名大法官。由于在任期限制之前确认的“传统”大法官将不受其约束，该政策可能会暂时增加在法院任职的现职大法官的数量。

第二，扩大下级法院。为满足人口增长对司法系统提出的要求，并确保司法系统能更好地反映国家构成，应该将联邦法官席位扩大 30%，以便来自不同族群、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法官能够做出更全面、更公正的裁决。

第三，改革司法提名和确认程序。在任总统可以借助一个独立的两党委员会以确保其提名的人选能够顺利成为合格的联邦法官候选人。此外，国会应该考虑为司法确认程序创建新的快捷通道，确保即使总统和参议院多数党来自不同政党，也能对法院提名者进行投票。

第四，建立可执行的道德标准，提高最高法院的透明度。目前没有针对最高法院法官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1973 年制定的现行《美国法官司法行为守则》应该得到加强，并扩大到最

高法院。关于法官在道德标准约束下的执行情况，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小组来监督，该小组负责调查司法道德投诉，并在必要时采取纪律行动。

第五，考虑限制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面对右翼激进主义未来的行动趋势，国会可以评估和限制最高法院对于上诉案件的审查和管辖权以防止司法过度扩张。

美学者：解决民主面临的挑战需要克服小州偏向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网站 7 月 6 日登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教授艾尔•弗勒姆（Al From）的文章称，美国民主正面临诸多挑战，民主党比以往需要更多政治皈依者。文章摘要如下：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对于“罗诉韦德案”以及枪支管控的裁决表明其观点已与绝大多数美国人相脱节。并且，在就“1 月 6 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举行的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共和党证人揭露了特朗普及其亲信的“未遂政变”，这是自内战以来美国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此外，在今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支持特朗普“大谎言”言论的候选人接连取得成功。上述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民主受到的威胁仍在持续。

美式民主为何会突然陷入困境？原因有二。第一，任何民主的活力都取决于民主制度与时俱进的能力。但在过去的 25 年间，参议院、选举人团和最高法院等重要的民主机构并没有跟上美国文化和选民的变化，这导致了国家政治的结构性失衡；第二，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而非人治国家，必须警惕狡猾、野心勃勃且毫无原则的政客对于篡夺政府控制权的尝试。

制度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参议院的结构。宪法规定，无论人

口多少，每个州都分配两名参议员。因此，近几十年来，参议院明显倾向于小州。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口比最小的 21 个州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但这 21 个州在参议院拥有 42 张选票，而人口更多的加州只有两张。而且，这 21 个州中的大多数都投票给共和党，因此，小州偏向置民主党于不利地位。

参议院的小州偏向延续至选举人团。每一位参议员都将为该州争取到一张选举人团票。所以，按人口比例来说，小州会获得更多的选举人团选票。此外，最高法院在设计上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公众意愿的变化。由于大法官是终身任命，通常而言，大多数大法官都由前任总统任命，因此不太可能反映当前多数人的意见。对于上述情况而言，最好的结果应该是两党联合起来改革制度促进现代化，但在政治极化的当下这不太可能发生。

要改变小州偏向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对于民主党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超越党派界限，在传统的民主党选区乃至小州吸引更多关心民主和“多数统治原则”（majority rule）的选民。这将要求民主党放弃他们通常以选民基础为导向的中期选举策略，并围绕维护民主和“多数统治原则”制定新政策。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 辑 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　　编：200020
电　　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